

并未满足,反而得寸进尺、咄咄逼人。那么,桑解阵今后是否还会进一步作出让步?它将让步到什么程度,才能既保证大选顺利举行又不损害其根本利益?这无疑将是个难题。现在,尼加拉瓜政府已邀请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代表,以及包括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内的国际名人前去观察和监督它的大选。在萨尔瓦多游击队问题上也作出让步,使第5次中美洲首脑会议就此达成了一项新协议。在8月初同反对派达成的协议中,桑解阵还在修宪、修改选举法等方面采取了新的让步行动。由此可见,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如允许流亡国外的尼加拉瓜人到领事馆去投票等等,尼加拉瓜政府还有可能继续作出让步。

第二个考验是,如果桑解阵在大选中获胜,它将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如何应付反对派可能因此而攻击它“选举舞弊”,掀起新的反政府浪潮;二是新的桑解阵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在国内建立稳定的政治体制?“北欧模式”能够行得通吗?桑解阵几年来的实践表明,它所谓的多元化,实际上是在确保其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实行有限度的多党制议会民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卫桑地诺革命的成果,保证尼加拉瓜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不再重新沦为美国的附庸。因此,在国内存在强大的合法反对派的情况下,建立何种有效的政治体制才能达到上述目的,将是桑解阵在大选后面临的重大课题。

第三个考验是,假如桑解阵出人意料地在大选中失利,它能象奥尔特加总统宣布的那样把政权交给反对派吗?如果把政权交出去,那么它掌握的10余万正规军和民兵、它建立和领导10多年的各级政权组织和群众组织是否也交出去?在桑解阵尤其是军队内部,是否都同意把权力交给亲美的新政权?如果桑解阵不交出权力而宣布大选作废,那就势必出现类似巴拿马5月大选后的紧张形势,甚至内战战火复燃。

这里必须说明,以上只是从尼加拉瓜的国情出发,设想可能出现的一些“挑战”。笔者无意对其大选与和平进程的发展和结局加以妄测。

综上所述,1989年以来,尼加拉瓜的和平进程已进入一个新的决定性发展阶段;如果不发生意外事件,这个久经战乱的中美洲国家,有可能结束战争,实现初步的和平。同时也应看到,由于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桑解阵将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和平进程不会一帆风顺,还将经历曲折复杂的道路。因此,对尼加拉瓜近期的和平前景不应过分乐观,而对其远景作出估计更是为时过早,因为有些因素的演变尚待进一步观察。

(作者工作单位:新华社)

尼加拉瓜革命的性质、道路和基本国策

汤小棣

尼加拉瓜在赢得战争、制止动乱和克服经济危机的考验中,迎来了革命胜利10周年。这场革命的性质、道路和10年来的基本国策是人们颇为关心的问题。

尼加拉瓜革命的性质

国内外学术界对尼加拉瓜革命的性质众说纷纭：有的说它不彻底，是资产阶级革命；有的认为它过激，是古巴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多的人倾向于把它看成是民族民主革命；笔者认为，尼加拉瓜革命不是一般的民族民主革命，而是由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各民主阶层广泛参加的、反帝反独裁的新民族民主革命。这场革命同前期由桑地诺将军领导的民族革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是它们的共同点，但前一次革命仅限于赶走侵略者，后一次革命却有着推翻独裁政府、建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尼加拉瓜等更深远的目标。

领袖人物的思想对革命性质具有重要影响。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创始人卡洛斯·丰塞卡1953年接触马克思主义，1955年参加社会党，1957年在苏联、东欧目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1959年因憎恶教条主义同社会党决裂，矢志开创一条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本国革命的新路。60年代初，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桑地诺思想中反帝民族主义和激进民主主义等革命内核，摒弃其排斥外来进步思想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吸取包括基督教革命思想在内的本民族一切优秀思想，赋予传统的桑地诺思想以新的生命，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桑地诺主义和基督教革命思想相结合的新桑地诺主义思想体系，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然而，由于条件的限制，丰塞卡对尼加拉瓜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战略作了错误论断，为70年代中期桑解阵组织分裂留下了隐患。

1961年7月23日，他根据新桑地诺主义，联合各革命青年组织，建立起政治军事组织——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桑解阵的成立是尼加拉瓜从旧民族民主革命向新民族民主革命转变的主要标志。

尼加拉瓜革命道路

为了推翻索摩查王朝，桑解阵自成立之日起，就领导尼加拉瓜人民进行了18年之久的新民族民主革命，从模仿桑地诺游击队，到学习外国各种革命经验和革命道路，最后才找到联合国内外一切反索摩查的民主力量，采用军事进攻、全国总罢工和全民起义相结合的独特的革命战略，取得了全国胜利。

60年代桑解阵斗争的规模较小，影响也不大。1963年的博卡依行动完全仿效桑地诺游击队的打法，60多名游击队员以洪都拉斯为据点，越过边界向国内进攻，在博卡依和科科河一带遭受索摩查警卫队伏击，死伤惨重。1967年的潘卡桑战斗是桑解阵在国内组织的第一次游击斗争，30多人联合少数农民建立起游击中心。由于农牧区检查官告密，马约尔卡率领的小分队袭击地方政权未遂，被警卫队包围全歼。这两次游击斗争都是以反对选举骗局为目的，机械照搬历史和外国经验而失败的。1967年到1974年，桑解阵进入整顿组织、总结经验、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默默积蓄力量”阶段。1969年初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制定出第一个完整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建立起第一批政治军事训练学校，为迎接新的斗争培养干部，积蓄力量。

1974年发生的两个事件打破了6年来的沉寂局面：以查莫罗为首的全国保守行动党联合

5个反对党和两个工会组织组成全国民主解放联盟，公开反对索摩查竞选连任；桑解阵圣诞节一次成功的袭击行动，救出了丹尼尔·奥尔特加等革命领导人。

1975~1978年，斗争形势又趋恶化，丰塞卡等领导人先后阵亡，桑解阵内部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应采取什么斗争战略上的分歧导致组织上的分裂：城市政治委员会认为传统战略已经失败，必须发动城市暴动，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一部分人形成了后来的无产阶级派；山区政治委员会持传统观点，认为尼加拉瓜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只有坚持农村游击斗争，才能最终推翻索摩查王朝，被称为持久人民战争派；第三派大多是流亡国外的桑地诺革命者，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同索摩查家族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其中爱国资产阶级不仅可以参加民族民主革命，而且可以成为革命政治联盟的组成部分，并进而得出索摩查统治下的尼加拉瓜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而是依附于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因此决定联合国际国内一切反索摩查力量，积极准备，等待时机，采取全民起义的战略，一举推翻独裁政权。他们被称为起义派。无产阶级派人数最少，城市斗争遭到索摩查残酷镇压；持久人民战争派领导的农村游击斗争收效甚少。1975年丰塞卡从古巴秘密回国，企图说服三派联合，也不幸于1976年底在西尼卡的一次游击战中牺牲。由于起义派战略策略对头，革命力量发展很快。1977年6月他们又团结了同情桑解阵的私人业主、知识分子、教士和工商界知名人士，后组成“十二人集团”^①，在国内外广泛开展统战工作。1977年10月，起义派向马塞亚、圣卡洛斯和里瓦斯发动军事进攻，力量和影响不断扩大。

1976~1978年，一些教会人士将索摩查践踏人权的情况公诸于世。美国为防止桑解阵掌握反独裁斗争的领导权，也打着“人权旗帜”，支持尼加拉瓜资产阶级开展“倒索活动”，并把对尼加拉瓜的军事援助从1974年的53.6万美元减少到1978年的2.6万美元，军事顾问也从500人减少到135人。1977年11月索摩查拒绝全国对话后，卡特邀请反对派领导人查莫罗访美，以示对索摩查不满。1978年1月10日独裁者杀害查莫罗，激起尼加拉瓜各界人民极大愤慨，罢工、游行和群众起义此起彼伏，发动全民起义的条件已逐渐成熟。

1978年夏，起义派一支小分队虽然取得了奇袭国民宫的胜利，但9月向马萨亚、格拉纳达和里瓦斯发动的强大攻势严重受挫。起义派认识到索摩查在军事上还有力量，单枪匹马是无法取胜的，于是大力开展国内统战和争取国际声援的工作。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准备和斡旋磋商，1979年3月7日桑解阵三派在起义派纲领基础上实现联合。由9大司令组成桑解阵全国联合领导委员会，统一指挥国际联系、军事政治和宣传组织群众等方面的工作。由于“十二人集团”在国内外的出色工作，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和国际组织与独裁政府断交，国内进步力量纷纷脱离资产阶级控制的反对派广泛阵线。加入桑解阵领导的统一人民运动和全国爱国阵线。由于索摩查拒绝美国倡导的国际调停和公民投票，并逮捕罗维洛和里瓦斯，美国停止供应军火。在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桑解阵的变化后，一部分反对派领导人，在索摩查

^① “十二人集团”于1977年7月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正式成立。为配合1977年10月军事攻势，桑解阵起义派委派其领导人作家塞尔希奥·拉米雷斯·梅尔卡多出面，把流亡在圣何塞的尼加拉瓜宗教、教育、经济和企业界等方面的知名人士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组织，以便在军事攻势胜利后作为临时政府成员取代独裁政府。因当时这个组织成员共12人，故称“十二人集团”。决战前，这个组织成员分赴世界各地，介绍国内革命形势，争取国际支持，对加速独裁政权的垮台发挥过重要作用。革命胜利后该组织自行解散。

和桑解阵之间选择了后者。1979年6月4日,桑解阵宣布发动最后攻势,同时号召全国总罢工和全民起义与之配合,为推翻独裁者调动国内外一切进步力量,形成了一支空前强大的历史合力。6月16日宣布成立临时政府5人执政委员会。7月索摩查被迫辞职,他的国民警卫队虽占有10:1的优势,却已成乌合之众,不战而降,万余索摩查分子逃往北方邻国。7月19日,桑解阵未经决战便赢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初步胜利。

新政权十年来的基本国策

政治多元化、混合经济和外交不结盟,是革命胜利前桑解阵和一切反索摩查力量政治联盟根据尼加拉瓜所处的革命阶段和基本国情提出来的建国三原则。它最早见诸1979年4月桑解阵全国联合领导委员会《走向最后攻势》的声明和6月18日民族复兴政府颁布的第一个执政纲领之中。

建国三原则是桑解阵的立国之本。临时政府无论是复兴经济,还是巩固发展革命,都离不开国内各阶层的合作和国际社会的大力援助,只有执行建国三原则才能赢得这种支持和合作。尼加拉瓜作为资源贫乏、工业落后,以出口农业为主的拉丁美洲小国,更离不开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尼加拉瓜远离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东、西欧,却近在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家门口,如何既参加国际分工又不失去社会改造和民族发展的独立性,始终是新政权面临的重大课题。尼加拉瓜只有坚持三原则,保持和拓宽与世界的交往和联系,不断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才能与反对革命的力量抗衡,确保民族独立、生存和发展。尼加拉瓜人宗教意识极强,教徒占居民90%以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比较弱,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不长。而几百年的西班牙殖民统治和美国的新殖民主义,使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思想在尼加拉瓜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市场,新桑地诺主义本身就是三种思潮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统一体。桑解阵只能以大局为重,继续按思想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的模式,引导思想分歧和阶级矛盾服从民族矛盾,形成为全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统一意志,赢得他们的广泛合作。私有制是尼加拉瓜经济的基础,占总产值的60%。扩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会谈失私人部门的合作,而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又会使政府失去控制,因此国家实行按计划分配外汇和通过金融体系控制和引导私人企业,发展混合经济,以确保私人企业的合作,防止出现国民经济全面瘫痪的局面。

10年来,围绕遵循还是偏离,坚持还是反对三原则,在桑解阵内外发生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斗争,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在复兴经济和推进革命中,出现严重偏差(1979年7月~1982年12月)

建国之初,桑解阵实行稳重谨慎的政策。在没收索摩查家族财产,实行银行、保险、外贸和矿山、森林资源国有化,开展土改、扫盲工作以及巩固新政权基础的同时,十分注意保护外资和非索摩查家族企业的利益,土改也规定了不伤害一般庄园主利益等严格的政策界线,努力巩固和扩大政治联盟。在广泛发展对外关系的同时,谨慎地保持和美国及中美洲邻国的联系,最大限度地争取外部世界对新政权的道义支持和经济援助。然而,1980年初政权相对稳定后,桑解阵领导中一些人急于推进革命,不适当地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提出“帝国

主义、左翼机会主义……卖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②是革命的三大敌人等错误口号，导致执行三原则出现严重偏差。在经济领域，为扩大公有制基础，加快经济复兴，政府不顾国力，不断增加投资，致使生产下降。《1980年经济复兴计划》原定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3%，实际为16.8%；原定国内产值增长22.5%，实际只达到4.6%。《1982年高效率与节约计划》原定投资占19.3%，实际为24.4%；经济增长指标为18.5%，实际只达到5.4%。大量投资不仅花光了筹集的复兴基金，而且使外债由1980年的16亿美元猛增至1982年的26亿美元，引起了大量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与此同时，政府要取消房地租剥削，在土改中默许并支持农民的夺地斗争，损害了一部分小业主和庄园主的利益。1981年颁布新税收政策，规定1万美元以上的私人产业，除缴纳所得税外，还应增交6%的国家复兴基金，使最高税率达50%，大批工厂倒闭（仅1982年就有40多家工厂倒闭），引起私人企业最高委员会强烈不满。此外，民族复兴政府还下令冻结国营企业技术人员的工资，引起数十万人外流。1982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4%，通货膨胀高达40%，职工工资普遍下降。

1980年后，尼加拉瓜在政治上也出现了问题。个别领导人不顾本国具体条件，要求建立一个以消灭剥削残余和创造一个新社会为目标的桑地诺党，发生了4次政府危机。1981年底1982年初由于民族政策失误，数千名米斯基托人逃往洪都拉斯，加入反政府武装。由于缺乏经验和指导思想失误，政府在外交工作中不适当地提出要求解决同哥伦比亚的领土争端^③，并发生与洪都拉斯的边界冲突。

二、抵御武装入侵，经济出现严重失衡（1983年~1984年）

这一阶段，里根政府把它在中美洲的战略重点从稳住萨尔瓦多转向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采取军事、经济、外交等一切手段企图将桑解阵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中。面对颠覆的威胁，桑解阵领导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是革命的长期目标，现阶段主要是争取独立、主权和自决的问题”^④。如果迅速转向社会主义，可能失去大部分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帮助，增加捍卫民族独立的困难，为美国继续执行侵略政策制造口实。为此，桑解阵政府在内外政策上作了调整，在共同抵御反政府武装入侵的前提下，对私人企业给予贷款优惠，鼓励它们合作生产，推迟成立桑地诺党，实行大赦，放宽紧急状态，允许反对派政党、组织和教会自由活动，延缓土改进程，并通过政党法和选举法。1984年桑解阵在大选中获胜，使政府建立在合法民选的基础之上。

政府主动调整国际关系，运用多方位外交孤立和打击美国的侵略政策。1983年初，它又向联合国安理会、海牙国际法庭和国际海事组织控告美国支持反政府武装在尼加拉瓜内湖和沿海布雷等侵略罪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1982年5月和1984年6月，桑解阵领导人两次遍访东、西欧国家，既争取到经济援助，也赢得了道义支持。除此之外，桑解阵政府还十分重视做本地有影响国家的工作，多次出访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巴拿马等国，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和平斡旋活动（曾同意签署1984年9月7日和平纪要文件）。1984年下半年民族复兴政府在墨西哥的帮助下，同美国进行了9轮副外长级会谈，对缓和尼美关

^② 尼加拉瓜《街垒报》，1980年3月12日。

^③ 1979年12月19日，尼加拉瓜执政委员会颁布法令，规定200海里领海，同时宣布索摩查政权让与哥伦比亚的大西洋基塔苏埃尼奥群岛为尼加拉瓜领土。1983年初撤回解决领土争端的要求。

^④ 尼加拉瓜《街垒报》，1983年3月16日。

系和地区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

1983年后,由于战事的发展,支援战争成为民族复兴政府一切工作的中心,人力、财力、物力优先为国防服务,巩固经济秩序退居次要地位。期间,尼加拉瓜的国内经济政策出现失误,如对国家和人民所有制部门实行100%的免税政策,合作社免税50~75%,个体经营者免税20%,但它们的经济效益却不如合作社,更不如私人企业。由于政府实行不适当的鼓励出口政策,1982~1984年间,对外贸易分别造成11亿、17.7亿和29亿科多巴经济损失;黑市、官价和交易所并存,政府为维持币值高估的兑换政策,3年中分别付出相当于当年财政赤字18.2%、16.9%和27.1%的代价;再加上补贴政策、高投资政策和贷款政策的重负,使政府不得不发行大量纸币,进一步扩大了财政缺口和导致居民向城市流动,造成1984年中期的严重经济失衡。

三、实行战时经济,着手全面调整(1985~1986年)

里根第二任期伊始,对尼加拉瓜实行强硬政策,中断曼萨尼约美尼谈判,将分散的尼反政府武装纠集在反对派联盟的旗帜之下,并于1985年5月对尼加拉瓜实施全面经济制裁和贸易封锁,决心“除掉”尼加拉瓜政府的“现行结构”。美尼矛盾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

面对侵略和颠覆的威胁,尼加拉瓜政府以民族团结为重,明确声明目前或15年内,尼加拉瓜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同时承认1979~1984年的投资计划大大超过了尼加拉瓜日益萎缩的技术、物资和财政能力。在广泛征求国内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政府制定宪法修正草案,与反对派政党、组织开展全国对话,在全国代表大会内外广泛讨论《草案》,终于制定并通过了包括政治多元化、混合经济、外交不结盟、独立、主权和民族自决、捍卫主权、保卫和平和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等基本原则的新宪法,将国家的一切活动纳入法制轨道。与此同时,实行战时经济,确保前线供应。政府还制定中期计划,准备用5年的时间进行经济调整,改变经济失衡状况,使经济恢复正常运转;并采取削减投资和财政补贴,实行货币贬值,调整工资,提高农产品价格等一系列经济措施。但由于战争的原因,恢复经济工作遇到困难。1986年私人企业最高委员会主席博拉尼奥斯承认,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60%是战争的破坏,10%是国际性危机,10%是中美洲共同市场的不利措施,私人企业抽逃资金和政府政策失误的影响只占20%。可见只靠调整经济政策是无法阻止经济恶化趋势的。为粉碎美国的侵略,尼加拉瓜政府开展了强大的外交攻势,领导人分别出访苏联,古巴,东、西欧和拉美国家,获得巨额经济援助和广泛的政治支持。1985年12月7日尼加拉瓜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86年6月,奥尔特加总统访华,增强了与美国抗衡的力量。美国的经济封锁和战争政策在世界上空前孤立,遭到第40届联大、海牙法庭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里根的政策受到国内外进步力量的强烈反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更加不得人心,在战争中连连受挫,损失惨重。桑地诺人民军和桑地诺民兵越战越勇,不断地取得斗争的胜利。

四、加速政策调整,全力推进和平进程(1987~)

1987年以来,尼加拉瓜新宪法生效,反政府武装内讧,国际出现缓和趋势,美国政府面临更迭,侵略政策难以推行,中美洲和平进程在阿里亚斯计划的推动下出现新转机,这一切构成尼加拉瓜国内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尼加拉瓜政府利用这一形势,对国内外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1987年尼加拉瓜政府同反对党和教会对话,实施大西洋沿海地区自治,撤回在海牙法庭对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的起诉,创造了国外和平气氛,有力地推动了中美洲和平协议的签订。此后,政府又要求全国社会各界支持《和平协议》,并率先成立民族和解委员会,对一批反政府领导人实行大赦,还一反过去坚决不同反政府武装谈判的态度,主动邀请奥万多红衣主教出面斡旋,促成了年底和反政府武装的两次间接谈判。桑解阵积极贯彻《和平协议》的做法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对1988年2月美国国会否决里根为反政府武装增加2.7亿美元援助的提案起了推动作用。

1988年3月23日的萨波阿协议可以说是里根战争政策失败的直接结果。此后,尼加拉瓜政府多次主动延长单方面停火,同反政府武装领导人连续进行了4轮谈判,充分表现出执行中美洲和平协议的诚意。1989年2月14日,尼加拉瓜政府又在中美洲5国首脑会议上主动宣布,将采取1990年2月在国际监督下提前实行普选、恢复同国内反对派对话、扩大公民政治权力、削减武装力量和国防开支等民主化步骤,对5国首脑《萨尔瓦多联合声明》的签署作出了重大贡献,使中美洲和平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在国内经济方面,奥尔特加总统反复强调国家正处在“保卫革命政权阶段”,而不是“经济发展的阶段”^⑤,使桑解阵各级干部认识到目前“在美国鼻子底下求生存,还得回到混合经济、政治多元化和外交不结盟三项原则上去”。操之过急,揠苗助长只能适得其反。1987年以来调整经济结构,主要是将国营和人民所有制企业的地位,从领导带头作用转变为联合和示范作用^⑥。控制国营和私营大型企业的发展,扶植和鼓励中小企业,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生活和地位,发展生产以防止人口向城市流动,根本改变经济失衡和恶化趋势。近几年政府已经采取了一再削减公共开支,减少补贴,改革货币,抑制通货膨胀,提高经济效益,利用市场机制等一系列经济调整措施。

综观10年历程,桑解阵在实践中对所处革命阶段和建国三原则的重要性有一个逐步认识和深化的过程:执政委员会时期由谨慎到偏离;1983年后开始认识,但执行不够坚决;新政府上台后认识逐步统一;1987年以来坚决贯彻执行,在经济、政治和外交领域都取得了不少成就,只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和经济政策上有失误,经济困难更突出一些。

1989年初,奥尔特加总统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满怀信心地宣布:“我们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桑地诺主义者……必须尊重我国社会的特点,执行按照尼加拉瓜实际制定的革命计划。必须和我国社会中的基本力量联合,和准备建设一个新尼加拉瓜的一切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阶层联合,对混合经济、政治多元化和不结盟的模式采取遵循和肯定的态度。”^⑦这表明,桑解阵在吸取过去10年执行建国三原则的经验和教训之后,将更加坚定地将这些原则贯彻下去。

展望未来: 机会和挑战

1989~1990年,对尼加拉瓜革命和人民来说至关重要,既是机会又是挑战。目前尼加

⑤ 尼加拉瓜《街垒报》英文国际版,1988年6月30日。

⑥ 尼加拉瓜《1987年经济计划》。

⑦ 尼加拉瓜《奥尔特加总统关于1989年经济计划的报告》。

拉瓜大选正处在准备阶段；桑解阵决定推举奥尔特加作为总统候选人；欧洲议会、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决定派观察员对尼加拉瓜1990年大选实行国际监督；政府已在改革选举法和制定新闻法，并已释放2000名前索摩查警卫队员，部分履行了对《萨尔瓦多联合声明》的承诺。布什总统一面派出副总统奎尔协调中美洲四国，保持对尼加拉瓜实施民主化允诺的压力；另一面将14个合法反对党同反政府武装捏合在一起，形成14党集团，联合起来在大选中同桑解阵较量。1989年4月初，14党集团已经在危地马拉城召开第一次大会。由于14党集团代表着从极左到极右很为复杂的意识形态，截至1989年7月底尚未推选出统一的候选人。1990年2月尼加拉瓜大选是桑解阵同亲美势力的决定性较量。从力量对比来看，桑解阵占有较大优势，临时拼凑起来的14党集团不会有多大作为，但对美国利用“民主化”旗号，纠集反对派乘尼加拉瓜国内暂时困难之机制制造动乱的企图，应该保持警惕。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萨尔瓦多大选后的政局及 对中美洲和平进程的影响

笋季英

进入1989年以来，中美洲和平进程出现了一系列积极因素，使这个地区持续了10年的“热点”开始降温。1月，萨尔瓦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提出新的和平建议，表示愿把选举进程变成最终结束战争的进程，建议大选推迟6个月，游击队参加选举；3月，美国白宫和议会就中美洲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表示支持中美洲5国首脑于1987年8月签署的埃斯基普拉斯和平协议；2月和8月，中美洲首脑第4次和第5次会议就尼加拉瓜提前举行大选和遣散在洪都拉斯境内的12000余名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分子问题达成协议；8月，苏联政府宣布停止向尼加拉瓜提供武器援助等等。但与此同时，萨尔瓦多右翼政党民族主义共和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其领导人克里斯蒂亚尼于6月1日就任总统。随着尼加拉瓜形势的变化，萨尔瓦多的战争问题也日益突出。萨尔瓦多的形势将如何发展，萨尔瓦多政府会不会成为中美洲和平进程的主要障碍。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极右政党民族主义共和联盟在大选中获胜的原因。

从客观来讲，首先基督教民主党在国内政策上的失误和失去民心，是民族主义共和联盟大选获胜的一条重要原因。1982年基民党领导人杜阿尔特任执政委员会主席时提出一套改良主义的纲领，1984年在竞选总统时又提出和平与发展的五大政策：即人道化、和平化、民主化、参预制、活跃经济，人们曾对基民党抱有希望。但8年过去了，基民党政府从美国方面得到36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而上述计划却没有一项兑现，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日益恶化，人民感到失望和不满是理所当然的。8年的反起义战争不但没有消灭游击队，反而建立

process, one is that the U.S. government still clings to the policy of interference and sticks to the strategic objective of squeezing the Soviet-Cuban influence out of the region of Central America, the other relates to the wide chasm between the Nicaraguan government and the opposition. So far there exists no evidence that the above two prime factors will not bring instability again to the situations of Central America and Nicaragua. Therefore, the peace process in Nicaragua will continue to face great challenges, and the prospects cannot be optimistic. (Shen An)

NICARAGUAN REVOLUTION'S NATURE, PATH AND BASIC POLICIES

On the basis of continuing the Sandinista revolution, Carlos Fonseca Amador and others combined Marxism, Sandinism and the revolutionary christianism to create the neo-Sandinism, and united all the revolutionary youth groups to form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organisation—FSLN, thus leading to the solution of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questions of the Nicaraguan revolution. This revolution, led by the FSLN and joined by all democratic walks of life, is neither bourgeois nor socialist, but neo-national and neo-democratic, with the nature of anti-imperialism and anti-dictatorship.

The Nicaraguan revolution has walked through a tortuous path in the past ten years. In 1977, the insurrectional faction among the FSLN rectified some of the mistaken thinkings within the revolutionaries as regards the Nicaraguan society and revolution.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bourgeoisie as well as of the favourabl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the insurrectional faction united the patriotic bourgeoisie and all the anti-Somoza forces and organisations both in and out of the nation to unify the three factions of the FSLN. Through the strategies of mixing military attack, general strike and popular rebellion, the FSLN succeeded in overthrowing the dictatorial regime of Somoza and won an initial victory of neo-national and neo-democratic revolution.

Political pluralism, mixed economy and non-aligned foreign policy, which have become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forming the nation, are the victorious product of the neo-national and neo-democratic revolution. This understanding, however, was not unanimously appreciated by the FSLN leade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ost-victory era. Therefore, policies which overpassed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revolution were implemented, pushing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into difficulties. Faced with the harsh realities, leaders of the new government reached gradually to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and began in 1985 to adjust economic policies. (Tang Xiaodi)